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十七期
2000年9月　　頁493～50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書評※

評漆永祥教授著《乾嘉考據學研究》

張　　壽　　安*

書　名：乾嘉考據學研究

作　書：漆永祥

出版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1998年12月

頁　數：340頁

這是一本擺脫意識型態純從學術與學術史角度探討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專著。全書可分爲三部分：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考據學的特點及考據學得失。作者很全面地探討了清代前期學術界與朝廷間的互動、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與學風的轉變關係，以及考據學者之間的交往和學術論辯；尤其深入地析論了考據學的多門分支學科：校勘、辨僞、輯佚、音韻、文字、訓詁、名物、典章、制度。最後，作者並特別指出考據學的思想性及其對現代學術分科的影響，並爲考據學作了一得失評價。

本書取材廣博，用心縝密，下筆謹愼，是一本非常紮實嚴謹的著作。作者閱讀了大量的清人專著、文集和年譜，尤其注力於學者間的通信，從個中觀察乾嘉學者間的交遊、行踪、論學和責難。因此本書最精采生動的部分就是聽作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者娓娓叙述當時學者間的交往互動，時而北京、時而蘇揚。隨著一幕幕鮮活的時空展開，乾嘉學者的經書校詁、義理論辯和學風易轉，也就在這舟車往返中積蘊而出。眞令人有置身十八世紀之感，也令沈寂的考據學者和枯燥的考據學活了起來。讀書至此，方知治考據學竟能有如此滋味！

本書的特點和創見之處相當多，很值得提出來供學界參考。以下試分章論其要點：

前言：作者視「考據學」爲一學科。歷來討論乾嘉考據學者多視考據爲一補苴餖飣、死鑽文字的治學方式，作者卻將考據學視爲一門學術科別，舖展說明考據學所牽涉的分支學科，如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注釋、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算、樂律、名物典制等。事實上，清儒以考據方式進行古文獻的整理，最終確是令環繞古文獻整理的各個學科都成爲一獨立的學門。不但是別子爲宗，連小宗支系也都蔚爲大宗。

第一章：作者討論乾嘉學術興起原因時，擺脫學界慣用的異族統治、文字獄等外緣因素，而純從「學術史發展之內在理路」此一立足點進行探求。作者在第一章中勾勒出清乾隆間考據學興起之前在康雍之際的學術空置期，顯示出義理學與考據學相互拉鋸，學術尙未定型。這段描述爲瞭解清初學術史提供了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其次，作者又溯源先秦、兩漢、直至唐、宋、元、明，指出經典研究自來即有的二條途徑：一重名物典制，一重義理闡述。同時也說明歷史上出現的幾次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工作，確實爲興盛於淸代、傾動朝野的古文獻整理，指出了學術內在理路的源頭。再者，作者將乾嘉學者的「反宋學」觀念，作了很清晰的界定。他說：「乾嘉學者所講的宋學，一般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宋代經學，幾乎全被他們否定；二是指宋明理學，則是有肯定有否定。肯定其正心誠意、立身致行之學，而否定其性理之學。對於宋代訓詁考據之學，他們不僅不反對，還樹爲楷模，表彰有加。」（頁24）這確是有本有據之見。清初學界反理學，大都集中在攻擊理學的空疏誤國，於是轉向經書謀求

治世之實策。最早對宋學提出攻訐的如毛奇齡、閻若璩、胡渭、惠棟幾乎都集中在批判宋代的經學。而惠棟更提出就「解經求經義」而言，必得將理學與經學區分開來，他最不滿宋儒的就是「援理入經」，這和援釋道入經混亂儒術是一樣的。當然，乾嘉之後發展出的尊經崇漢學風，在尊經義斥理義的學術內捲途轍下所開展出的全面反對宋明理學，另倡一種新義理學，甚至轉向尊崇禮學以爲修身制行之方，則較康雍儒者的路向，又是另一層轉進了。

第二章：作者從乾嘉時期社會、經濟與文化政策方面探討考據學興起的原因。除去人口增長、經濟繁榮帶起的造紙業興隆、書籍刊刻流傳廣泛，以及鹽商參與到文化事業的建樓藏書、結詩社、蓋戲園、重金招徠聘用名士校勘古書、鑑定名畫等等之外，最突出的是作者提出清廷的文字獄及禁書政策和考據學的興起之間並非如當前學界所言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是二者分立的。作者根據一百件文字獄分析，證明清統治者禁書和文字獄的主要對象並不是高層知識分子和時賢名流。相反的，這些案子的主角都是一些下層群眾。如：監貢稟生、老秀才、鄉民、手藝人、占卜者、書吏、塾師、江湖郎中，甚至無業遊民、地痞無賴。這層發現可說是繼陳寅恪、孟森二先生之質疑，作了更進一層的實事證明，對研究清代中期以後的民變及地方秘密會社，提供了一個值得追索的新思考方向。另一個新穎的看法是，作者對一向被學界堅信的西學影響說提出反駁。作者提出證據說，自雍正元年驅逐傳教士一直到乾嘉間，朝野學界對康熙時盡人皆知的中西曆法之爭，其實是「公私之書皆不詳」；足證學界誇大了西學影響說。

第三章：乾嘉考據學方法。作者從五個方面進行討論：㈠小學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尤其強調清儒對古韻體系整理之臻於完善，指出清儒在訓詁學上最具革命性的成就就是由「以形求義」轉向「因音求義」。並進一步指稱清儒在因音求義上最異於前儒的地方是，從博引經典以爲據轉至專注於古音古義的會歸，從而分辨出古音韻之系統。㈡古書通例歸納法的規律化。這也是本書的創

發要點。作者將清儒進行的古書通例歸納分成三類：標舉大義例、行文修辭例、發疑正誤例。元明儒者在古書辨僞通例上成就卓著，清儒則更充分意識到讀書必明其例的重要性。淩廷堪治《儀禮》，所採用的經緯途徑就是「例」。江藩更說不僅經書有例，諸子史皆有例，就連注也有例。清儒通過書例以依類推闡經義的方法，確實對他們的文獻整理工作貢獻了極大的助力。㈢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考證方法。作者特別讚美清儒以經解經、以字解經、以經解字的方法。指出這種本證、本校的方法具有強勁的說服力。同時也標示出清儒治經雖是從讀注疏入手，但其歸結卻是突破注疏的局限，進而修正注疏之偏失。尤其唐、宋以來，無論是注疏解經或義理解經都時常有彼經與此經相互矛盾，甚至一經之內前後矛盾的現象。在清儒潛心研索「獨尋天徑」之下，終而擺脫傳注直尋經義，必使一字之義貫通群經方爲定解。㈣實踐親驗與文獻材料結合。重視親身體驗是清儒治學的另一大特色，戴震修《汾州府志》、《汾陽縣志》就曾親歷山川市鎮觀其地理、形勝、水利、農務。而清代金石之學的興盛，也與清儒遍行天下臨摹碑刻、鑑定出土器物有關。㈤博涉專精與綜貫會通。清學雖然有「吳學最專、徽學最精」之說，究其實，在博涉基礎上求得專精，才是當時學者共同的治經方法。所謂「專力貴在一經，而參考貴在群經」①，因爲「經與經相表裏」，由博而約，從而貫串。淩廷堪治《儀禮》就正是與《論語》互求會通。

第四章：乾嘉考據學派別。這是全書最具創見的章節之一。有關乾嘉學術的分派，自江藩、章太炎以來多分成吳、皖、揚州，間或增加浙東、浙西二脈。本書則提出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分立之說。作者從學術淵源、時人評論、學術特色，以及惠、戴、錢三人之交往和學術地位等四方面詳細分析比

① 江藩：《經解入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4，〈經與經相表裏〉第18，頁87–88。

較。作者指出錢氏家鄉嘉定，學術興起於明嘉靖、隆慶間，以史學爲盛，錢大昕祖父錢王炯更曾南遊浙東濡染浙東學派的治學之風。故錢大昕治學經史不分，主張經自史出，近於章學誠，和戴震專治經學「不讀漢以後書」②完全不同。同時，惠棟、戴震卒後（乾隆二十三年、四十二年），錢氏正轉赴鍾山、婁東、紫陽書院任山長，執東南學術牛耳近三十年，成爲與惠、戴鼎足而立的一代宗師。尤其與錢、戴同時或稍後的學者在評斷二人學術地位時，每以「直紹兩漢者，唯閣下一人而已」（淩廷堪語）、「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江藩語）稱美錢氏之學，或謂錢氏是繼惠、戴之後而「集其成」（段玉裁語）。足徵在乾嘉學者心目中錢氏的學術地位，是絕不低於亦不附屬於惠、戴。戴氏當年一句「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導致後代學界只知戴、惠，而未給予錢氏獨立的學派地位。其下又細分三派之學門擅長，惠派長於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注釋諸學；戴派側重文字、音韻、訓詁、目錄、校勘、天算、名物典制、地理、樂律，尤其兼治義理；錢派長於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天算、名物典制、地理、職官、金石、避諱、氏族諸學。其實錢氏在史學上的貢獻遠非上述二人所能企及。而錢氏專力治史亦意在糾正時人熱衷治經之偏，其後「嘉定九錢」、邵晉涵、洪亮吉、孫星衍、張澍、鈕樹玉、李銳及沈欽韓、汪輝祖、梁章鉅皆劃歸錢派。作者將錢學獨立成一派別，確屬卓見。吾師杜維運先生潛心乾嘉史學三十有年，即「深感錢氏經史淹貫，由經治史，其學乃蹊徑另闢，光遠而大，固非戴氏之所可及」③。惠、戴之學盛於經，錢學博通，非二派所能囿。本書從經學角度立論，殊途同歸。足證乾嘉學術派別中錢氏經史學之獨立地位確鑿可立。

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別論述惠棟、戴震、錢大昕的考據學。第五章惠棟考據

② 江藩：《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3，頁49。
③ 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311。

學述論。作者下了相當的工夫，考證出惠棟一生繁富著作的各書撰成年代，先後序列，對研究惠棟學術立下了基礎之功。同時，作者又費了相當心力闡述惠棟對漢《易》學的整理研究。這些都是之前學界尚未關懷到的重點。尤其作者指出惠棟不滿朱熹視《易》爲卜筮之書、亦不滿毛奇齡、顧炎武治《易》之「非漢非宋」；毅然轉而溯本於漢《易》，以明源流、重師承家法的態度治《易》，開始了乾嘉學界的崇漢學風。其中，作者又特別指出惠氏《易》學的思想性，如：《易》主時中說、明堂大道說，以證明惠氏法古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並指出惠氏反宋儒天理人欲二分的言論，直接影響到戴震。最後，作者並對惠氏小學詁訓之學的「拘形索義」與「望文生訓」提出批評。並指出惠氏雖然大倡古字、古音，但其本人對音韻、詁訓並無深入研究。小學詁訓研究法的改革，尙有待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等。

第六章：戴震考據學述論。分五點論述：㈠小學，說明戴氏在文字、訓詁學及古音韻學上的重要成就。並指出因其時古韻分部入聲尙未獨立，通轉之理未明，所以戴氏所謂的轉聲，實際上是非同一聲母之間的通轉。㈡天算學。戴氏天算學受梅文鼎影響最大。但其數學研究方法仍是中法爲主，兼采西法，最著名的成果是《勾股割圜記》和《算經十書》。尤其後者，令「顯於唐、晦於宋、亡於明」的中國傳統數學經典重見天日。繼起者更進一層用中國古法對高次方程式進行深入探討，取得很大成果。㈢名物典制之學。名物典制之學，繁難雜冗，歧說多出，號爲難治。戴氏運用其精於音韻訓詁、天文曆算樂律之學的特長來治名物典制之學，爲其後的名物典制之學奠定基礎。《考工圖記》對古器制度不但詳考型制，並繪製成圖。又由典制的辨析關注到古社會之禮俗，考屈原〈九歌・東皇太一〉是祀典之賦，而非祀神之歌。〈學禮篇〉、〈記冠冕〉諸作，尤有助於「三禮學」的研究。㈣地理學。自〈禹貢〉以來，古地理學的研究就重視郡縣沿革，但又苦於歷代沿革無秩，極難統理。戴氏治地理，一則受《水經注》影響，一則直紹鄭樵，他以不動之山川統御萬變之郡縣，統

理中國地理編得《水地記》一卷。戴氏修方志也是採用此一方法，其編目次第，首列地理及沿革表，其次爲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官置……，其下才是古冢墓、風俗、藝文。和章實齋修志最重徵存文獻、人文活動等大異。㈤義理思想。因論述戴氏思想之作已甚多，故作者在此節只略言一、二。作者指出「理」字之解乃戴氏「自己的闡釋觀點」，「然後廣引舊注以張其說」。於是作者把重點放在批評戴氏「由考據以求義理的原則並未能一貫始終」，因此質疑戴氏義理論點與論據之間的關係，其實仍不脫宋儒「六經注我」之故智。

第七章：錢大昕考據學述論。作者列舉錢氏之學的四大特點：㈠古聲紐研究，錢氏是對古聲紐進行科學分類的第一人，破解了純從韻類上辨異古音之理的困局。㈡目錄、版本、校勘之學。錢氏之學以治史爲歸，故其在目錄學上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探究四部分類法的源流、沿革。又因精於遼、金、元史，遂由考察當時期的文化學術變遷，而對舊四部分類的細目進行了新的分類，這都是前人所無的錢學創舉。㈢氏族譜牒、避諱、蒙古文字之學。錢氏精通蒙古文字，又特重譜牒之學，對元史氏族有詳明考辨。近代譜牒學大盛，錢氏實啓其端。㈣作者特別舉出錢氏的「經史無二說」，以和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前後呼應，認爲這是將史學地位抬高等同於經學地位。並引余英時先生言稱錢氏此序「可以看作清代史學家的『獨立宣言』」④。筆者深表同意。

第八章：乾嘉考據學思想。這也是頗具創見性的一章。作者首先討論乾嘉考據學者的學術分類思想，幾乎全面歷數了戴震、王鳴盛、盧文弨、段玉裁、錢大昕、焦循、孫星衍、章學誠、阮元、姚鼐、江藩等的學術分類觀。這在乾嘉學術的研究上，可謂是開創之舉，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其二，作者探

④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477。

用豐富的書信資料詳細地討論了乾嘉學者間對義理、考據、詞章孰輕孰重、孰本孰末的爭辯。一般學界都知道袁枚以「考據學」譏稱乾嘉經學，引起焦循、孫星衍的反駁。但如此原原本本把此一論辯上溯惠棟、下迄江藩、方東樹、章學誠，甚至龔自珍，做詳細論述的，當以此節最爲全面。其三，乾嘉考據學家論義理之學。乾嘉考據學者以明聖人義理爲最高學術標的，是學界共認之事實。本節的二大特色：一是指出乾嘉學者有「儒學求本化」的思想，所謂傾心復古、正本清源。林慶彰先生十餘年前即揭示清儒考據的學術思想性是「回歸原典」，本書雖用詞有異，但在觀察上則殊途同歸⑤。二是把清儒通經致用的思想落實到「恢復三代禮制」上，指出「復禮」是第一要事，並稱漢儒的「以經術飾吏事」令乾嘉學者稱羨不已。這也暗觸了乾嘉義理思想之新幟。

第九、十章討論乾嘉考據學得失。作者以《詩經》學的整理研究爲例，說明乾嘉考據學在學術上的成就，論述詳實，極有見地。又舉校勘學爲考據學分支學科之一，討論其方法理論的建設。這是作者繼前言所提之新見，落實在具體學科內進行討論。值得留意的是，作者不僅說明衆校勘學家校勘原則之異同，並討論到他們相互之間的辯論。事實上，異議與爭執是最能突顯出分支學科自身理論與方法之漸形孕育，這是學科獨立的前奏。其下，作者提出乾嘉時期學術有社會化及學者有專業化的趨勢。這也是極具創見性的觀點，值得深入研究。末二節作者試圖爲乾嘉學術作一評價，這是很難的工作。如作者言乾嘉學術基本上仍是對封建制度進行補罅堵漏，並不具梁啓超所言啓蒙思想；又談到乾嘉考據學和其後《春秋公羊》今文經學興起的關係，以及諸子學蔚起等。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學術議題，得進行專題探究，在尙未獲睹更紮實的研究成果前，進行評論是很難深刻的。

---

⑤ 參考林慶彰：《明代考據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及《清初的群經辨僞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二書。

第十章：乾嘉考據學的式微與弊端。作者列舉五項：㈠治學風氣的由實而虛。㈡實事求是與拘守經籍、漢儒間的矛盾。㈢治學方法與材料運用方面的局限。㈣考據獨尊、排斥其他學科。如：辭章、西學。其中以㈡、㈢項直接從考據學的治學方法、治學理念釐出其學術理論內在的缺失最為可取。誠如作者所言「古書有通例有特例，但更多情況下並無成例」；若一切以例律之，強無例為有例，自不免僵化例則，甚至曲解經義。實事求是反倒成了「以例造偽」了。其他各項則時與本書之前所舉議之相關主題在論述上時有出入，或許是議題太過繁富複雜所致。

本書所提若干議題，雖只是初步，卻與筆者的長期關懷相契合，茲舉其大者，與作者商榷：

㈠作者認為乾嘉時期「疑古辨偽之風逐漸消歇」，反對學界所言乾嘉考據學興盛之一因是承續並發展了宋以來的疑古辨偽之風。其實，從辨偽疑古到考證學興起，這之間縱有宋、清學術型態之異，但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乾嘉時期「懷疑之精神變為篤信，辨偽之功夫轉向求真」⑥。從學術發展角度而言，未嘗不可視之為「辨偽學的另一層轉進」。

㈡「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筆者認為這句話只可以當做是清儒治經求道的基本理念，指引一個治學方向。絕不可以死守這句話，把它當成數學原理一般，眞相信清儒就是執守此一邏輯去尋聖人義理。何況，事實證明，清儒自戴震以降從未有人眞用此法闡釋出一套義理來。所以，訓詁是基礎，義理是目標。但當進行義理體系建構時，清儒的訓詁也絕對是有選擇性的。

㈢經史地位。清三百年間經史地位的升降，一直是筆者極感興趣的議題。作者極有識見地把錢大昕獨立於吳、皖二派之外。的確，錢氏的史學考據、經史不二說，轉至章實齋的六經皆史、龔自珍的六經諸子皆史，以及龔氏的以治

⑥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上册，頁320。

史方法治經，再至晚清的古史考辨，把中國的古史和學術發展完全翻出了個新面貌，這絕非戴、惠的經學考據所能預見。及至民初，史學從邊緣學科進入中心，經學則從中心走向邊緣。這一長脈的經史變化，是近代學術史上的精采樂章，尚有待學界細究。

㈣學術氣象。作者描繪乾嘉學者交往情形是互爲師友，論辯學術也是友善公開的。這確是事實，但只是一面。乾嘉學者因論學不和而相互攻訐、變友爲敵，甚至譏諷謾罵、互相迴避不再照面者，比比皆是，最激烈的莫如方東樹責罵漢學家斷子絕孫。同時，乾嘉學者間的著作剽竊、抄襲也是層出不窮，時至今日仍有若干公案難斷。這等學界風氣是否眞如曾國藩所言是棄理學不言的後果，値得再究。

㈤其他如「學術分類」，也是全書最精采的部分之一，値得再進一步追究。

較細節的修正只略提二處：㈠錢大昕執教的「紫陽書院」，若能註明是「蘇州紫陽書院」更佳。因清代紫陽書院甚多，共有七處：山西天鎭、江蘇蘇州、浙江杭州、安徽歙縣、江西婺源、湖北漢川、貴州鎭遠。僅長江下游就占了四處，標示地名，可免混淆。㈡第三章古書通例歸納法一節，稱俞樾襲自江藩之《經解入門》，其實大誤。因《經解入門》乃僞書，託江藩之名刊世而已。唯作者於書成之後亦發現此一錯誤，並撰文自正⑦。

經學難治，乾嘉經學考據尤其難治。作者以深厚的文獻學基礎，勤奮細心的治學態度，積十數年功力，成此專著，創見甚富，極有功學界，令人讚佩。蓋清代學術研究自梁啓超、錢穆啓其端，七十年代曾盛極一時，旋即中斷。其實，清代學術位居中國近代之開端，又是儒學從宋明理學轉至五四反禮學之中

⑦ 漆永祥：〈論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及谷建：〈《經解入門》辨僞〉，二文俱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1輯，頁343–369及頁406–420。

間，三百年之清學未明，不只是中國前近代之學術不明，尤切要者是指引中國學術未來開展之可能性的基礎亦不明。因此，清學研索有其實質意義的迫切性。近十餘年來，清代學術的研究尤其是乾嘉學術的研究在中研院文哲所的大力推動下，引起學界重新重視，新的觀點和詮釋也逐漸提出。本書的撰著，無疑爲此一園地增添一生力軍。章學誠把治學分爲「功力」與「學問」二層，他說若能從功力中見得學問則無論注《爾雅》虫魚，或效淵明讀書觀大略皆可求得學問，要點只在「但要有自得之實耳」⑧。永祥教授此書，考據詳贍、論述公允，在紮實的史料上建樹心得，眞可謂由功力見學問，誠「自得之實」也。謹期待作者續有佳作，共同拓墾清學。

⑧ 章學誠：〈又與正甫論文〉，《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卷29，頁337。